

日本右翼社会战争观与历史观批判

王希亮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引领下,以美化侵略战争、推诿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为表现形式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反映了日本政界和右翼社会根深蒂固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仍然在作怪的现状,除战争时期日本当局炮制的“自存自卫”、“亚洲解放”等荒谬史观死灰复燃外,还相继抛出“东京审判史观”、“自虐史观”以及“日本罪恶史观”等,借以蒙骗视听,混淆黑白,冲击和干扰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为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化奠定基石。

关键词:日本右翼;社会战争观与历史观;批判

作者简介: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哈尔滨,150018

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已经过去近70个年头,然而日本政界和右翼社会仍然坚持战争时期的反动立场,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推诿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谢罪和民间赔偿,甚至肆意美化“大东亚战争”,反映了日本政界和右翼社会根深蒂固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仍然在作怪的现状。本文揭示日本右翼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批驳其本质意义及荒谬性。

一、“东京审判史观”

美国结束对日占领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政府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使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于是,原本就对战败耿耿于怀,东京审判时又得以开脱的部分政治家冒出头来,说三道四。最典型的人物是爬上内阁总理宝座的岸信介。他在台上时曾说:“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初期对日政策的中心是让国民承担一切战争责任,是想让日本国民意识到今天的困苦和屈辱完全是自作自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京审判使用的是绝对权力”,“占领初期的基本方针是变革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即从根本上剔除和破坏日本国民的伦理道德……其集大成者就是今天的日本国宪法”。^[1]这里,

岸信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东京审判史观”这一概念,但是却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对东京审判十分不满的信号。

到了1963年,“转向”作家林房雄开始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长篇文章,^[2]后来汇集成册,发行量不菲,成为战后第一部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和歌功颂德的专著,也成为后来右翼社会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理论根据”。林房雄公开表示:“我不承认东京审判,从任何意义上也不承认。那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是战争的继续,与正义、人道、文明都没有关系。”^[3]应该说,林房雄这席话是知识界第一次对东京审判提出的“质疑”。

1976年,历史学者伊藤隆^[4]在一篇论文中称:“战后日本,之所以对战时体制用‘法西斯主义’来表现,很大程度来源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判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胜者的民主主义(议会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主义,即共产主义——括号原文)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和正统化。判定战败国的侵略属性是法西斯主义,承担战争的一切原因,领导人为战争责任者。”^[5]第二年(1977

年),伊藤隆又在另一篇论文中称:“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判决,规定了解释昭和史的基本方向……(日本)脱离了战时的‘皇国史观’,却被‘远东审判史观’取代,并且形成定式化。”伊藤隆论文发表后,立即遭到史学界的批判,有文章指出,伊藤氏的“远东审判史观”是“连东京审判的特性都没有接触,不诚实地做学问的谬论”,“他提出的‘远东审判史观’,为了给读者以负面印象,用的是贬低的语言,经不起学问的检验”,“不过是宣传和煽动的政治用语”。^[6]伊藤隆该是最先用“史观”一词批判东京审判的学术界人士。

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开始推行以建设政治、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新保守主义路线。1985年7月,中曾根在出席自民党轻井泽研修会时称:“日本曾经有皇国史观,战后却被太平洋战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所毒害,日本人必须确立民族主义。”^[7]他还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战后日本存在动辄否定日本的自虐思潮,像‘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财阀’等说法,都是战败国的政治后遗症。”^[8]这里,中曾根康弘第一次把伊藤隆的“远东审判史观”更换为“东京审判史观”,成为日本政界第一位提出“东京审判史观”的官方人物,也是首次抨击反省战争属于“自虐”的政治家。从此,也揭开了朝野上下批判和诋毁东京审判的序幕。

正因为中曾根康弘等政界领导人的历史观使然,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公然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随之,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跳了出来,成为战后第一位“失言大臣”。还是在中曾根的任上,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坚持皇国史观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当局顺利通过。这一切都表明,中曾根等人抛出“东京审判史观”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意味着日本国内超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思潮开始涌动。

1993年8月,针对内阁总理细川护熙“侵略战争”的讲话,已经下台的自民党部分议员成立“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推出代表自民党战争观和历史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括》,无异于向国内外发出了声讨和批判东京审判的动员令。

于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下简称自研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昭和史研究所”、“历史修正协议会”等知识界右翼团体,以及“正论派言论人”小堀桂一郎、渡部升一等人都在积极行动起来。^[9]攻击“东京审判的理论直接规定了历史教育的核心……美国人在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约7年的占领期内,(东京审判史观)成为改造日本人思想计划的重中之重”;^[10]东京审判“使日本人对自国的战争产生罪恶感,影响到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11]“现在,还不能从东京审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之人,一定是自虐史观的持有者!”^[12]东京审判“这一史观生命力很强,尽管在苟延残喘,但是它的瘴气污染着我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和历史学界,而且这种毒害仍在继续着”;^[13]“东京审判无论如何不能给人以公正、中立的国际审判的印象,只是占领行政的措施之一”,^[14]“是胜者审判败者的复仇法庭”等等。^[15]

千叶大学教授清水馨八郎呼吁国民“从虚构的东京审判史观中觉醒过来”。他认为,“被这种错误史观的精神控制,成为战后诸恶的根源。谢罪和不战的低下外交、中韩的内政干涉、国民的自虐史观、祈祷反战和平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信奉东京审判史观的结果。只要不消除这一史观,日本在外交上、精神上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16]

曾任海军少佐的富士信夫对“东京审判史观”下的定义是:“东京审判法庭判决的所有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判决)日本侵犯了国际法、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协定,是‘侵略战争’。日本过去的一切行为、行动都是犯罪,是‘恶’的。”^[17]富士信夫为此“痛心疾首”,他指出:“直到今天,‘东京审判史观’继续对日本产生重大的恶劣影响”,(尤其)“肩负日本未来的年青人受到这种‘东京审判史观’的污染,抱有错误的历史观,对日本的将来是重大损失。”^[18]

其实,所谓的“东京审判史观”不过是日本政治家和右翼社会虚构炮制的史观。众所周知,战后的日本社会根本没有进行彻底的战争反省,也没有像战后德国、意大利政府和人民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追究战争犯罪,诚恳地向被害国家和人民赔礼道歉,谢罪赔偿。战后以来,充斥各家书店的有关战争

的出版物,多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受害遭遇,东京大轰炸时民众的惨状,冲绳战军民的“玉碎”,日本投降后海外邦人回国时的艰辛等战争被害读物。在这些出版物中,日本和日本人民俨然成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而真正揭露日本军队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反映日本殖民地和占领区下民众悲惨生活,披露日军违反国际法、进行人体实验和实施细菌、毒气作战的出版物却极其少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的陆续问世,才使一些日本人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731细菌部队,以及战后被隐匿近半个世纪的其他战争罪行。这一事实正充分说明,所谓的“东京审判史观”不过是虚构炮制的史观,它只是部分战争经历者、政治家以及右翼文人对战败的耿耿于怀,对战胜国的内心宣泄,对“大日本帝国”“昔日辉煌”的无望眷恋罢了。他们所希冀的是,借此扩大舆论,争取民众,欺瞒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年青一代,从而颠覆东京审判的结论,恢复日本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推进日本走政治、军事大国道路的步伐。正像近代史学家中村政则先生指出的那样,“我的立场是,他们所称的东京审判史观并不存在……不过是政治家和右翼势力鼓吹狭隘的国家主义所利用的意识形态而已。”^[19]还有一位日本学者评论认为,“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大部分人,带有浓厚的政治复古主义色彩,这与战后日本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方向及其精神构造,有着极大的背离感。”^[20]

二、“自存自卫史观”与“亚洲解放史观”

右翼社会一直把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称作“大东亚圣战”或“大东亚战争”。2000年,昭和史研究所头面人物中村粲、原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A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日本遗族会事务局长板垣正等人通过社会募捐在石川县的金泽市树立起一座“大东亚圣战大碑”,“大碑”正面是太阳旗的标志,刻有“大东亚圣战大碑”的字样,旁侧有草地贞吾书写的碑文,内容是:“大东亚圣战是光照万世的镜子”,另一侧刻有“八紘为宇”。可见,他们心目中依然坚持战争时期的官方宣传,把这场侵略战争视为“圣战”,公开为侵略战争张目。

曾任关东军参谋的濑岛龙三对“大东亚战争”下的定义是:“大东亚战争作为日本是被动的自存自卫,而不是有计划的与美国为敌的战争”;“日本领导层在(对美)开战前,尽管竭力避免战争,但未能实现,实在遗憾”;“战争的责任不只在日本一方,正像东京审判时印度法官帕尔指出的那样,‘由于在外国资产全部被冻结,把日本逼上了穷途’,美国也应该负有战争责任。”^[21]以上,该是右翼社会的普遍观点。

2006年12月,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65周年的日子里,产经新闻社主办的《正论》刊行一部特集,题为《大东亚战争——日本的主张》,副标题是《真的是耻辱的战争吗?》,封面还印有醒目的提示语:“开战65周年,最希望战后一代认真去读”。因为这部特集集中反映了右翼社会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所以有必要予以披露和解析。

特集收录有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和评论家日下公人的“对谈”文章。渡部升一开篇引用一段战争时期流行的《大东亚决战之歌》的歌词,称:“日本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英美的桎梏中解放’的第二年,在东京召开了历史上可以称作首次亚洲峰会的大东亚会议,国民从开战之初就抱有‘从白人列强解放亚洲’的心情。”^[22]评论家日下公人则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宣战诏书作为“自存自卫”的“论据”,他认为:“由于ABCD包围圈,政治和经济方面遭到逼迫,为了‘自存自卫’不得已开战。”接下来,渡部大谈特谈“自存自卫”的理由,他说:“美国可以自给自足,英国有世界1/4的殖民地,荷兰有印度尼西亚殖民地,苏联也能自给自足,惟有日本不行,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行,日本建立满洲国就是为了自存自卫‘生命线’……满洲是满洲族的土地,建立以满洲族皇帝溥仪为皇帝的国家不是侵略……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作为东京审判的证据被驳回,这是否定日本侵略大陆的第一手史料……(日俄战争)日本只是获得了铁路权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也绝不能说成是侵略,在帝国主义时代,像这样善良的(国家)只有日本。”^[23]为了给侵略战争戴上一顶“自存自卫”的桂冠,渡部和日下氏一唱一和,重弹“ABCD包围圈”、“东北非中国领土”等老调,还散布极其荒谬的强盗

逻辑。即：因为自己家里没有，就要到别人家里抢夺，还自诩为“善良”，不是侵略。为了把战争责任推给他国，渡部还臆造了日本周围存在的“三种恶意”或“三种敌意”：“一是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蔑视”；“二是支那人和朝鲜人对日本脱离华夷体制的蔑视”；“三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24]进而得出日本发动战争的“正当意义”。

关东学院大学教授富冈幸一郎有一篇评论“大东亚战争”之“义”的文章。他认为日本战后把这场战争称作“亚洲、太平洋战争”是“语言的失败”，主张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自由主义派称之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读卖新闻捏造使用‘昭和战争’，这是60年前在占领下决定性的语言失败，我们必须痛感到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站立起来，GHQ（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简称）支配下形成的战后体制，到了平成时代越发强化，是受15年战争史观的束缚所致。”^[25]他主张：“必须把大东亚战争置于广域的‘东亚百年战争’的文明史去把握……从反反复复毫无意义的是否是‘侵略战争’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林房雄使用‘肯定论’这一语言，就是从伪装成历史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战后史观意识束缚下解放出来”，“我想说，大东亚战争至今仍没有终结，‘战争’不只是物理性的‘战斗’，还包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战斗的‘义’，即战争的理由和思想。战后日本人根本没有去议论大东亚战争的‘义’，这是战后日本人语言的失败，包括战后历史在内的150年的广域历史中，必须重新认识大东亚战争的‘义’。”^[26]那么，富冈所谓的“义”究竟是什么呢？富冈称：“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人肩负着一个课题，即超越已经西洋文明化的自我，从这个意义说，战争是亚洲，即日本抵御西方列强粗暴支配殖民地，是超越西方近代化的大东亚之战，是自存自卫的战争，也是解放亚洲的‘义战’。”^[27]富冈还在文中大量引用了战争时期右翼鼓动家德福苏峰的论著以及“特攻队员”的诗文，最后引申到战争的“义”上。他的结论称：“所谓大东亚战争之‘义’，不是历史的解释，首先是后世同胞应该倾听殉难者的声音，并从中得出结论。岁月已经过去60年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在追问着日本人。”^[28]富冈的主流

观点仍然是“自存自卫说”和“亚洲解放说”。不过，富冈又与渡部升一等人有别。一方面，他认为“日本的亚洲政策与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支配有明显的区别，同亚洲诸国之间并非没有‘连带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近代日本的亚洲战略向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斜，由于统治和战火给予（亚洲人民）极大的伤害和苦难，应该明确地谢罪。”^[29]

“正论派言论人”小堀桂一郎是此期《正论》的主要出场人物，他的文章题为《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小堀先提出一个“国内之敌”的概念，他认为“国内之敌”是：“利用手中的理论凶器，加入到对敌内应、诽谤祖国大合唱中的党派，当今世界一切反日排日派最有效的手段是滥用‘日本=侵略国家论’。”而且，他所指的“党派”并非是某些特定的组织或团体，而是“不分职业、阶层、年龄的区别”，“不论是政治家、执政党、还是在野党”。^[30]接着，小堀又提出一个“历史解释权”。他称：“近些年来，每遇到机会我就反复强调‘被剥夺的历史解释权’问题”，“把被剥夺的历史解释权，即我们自身的历史再夺回来是一场思想斗争。实际上，从很早时期，作为胜者的联合国就从独立国家的日本人手中夺走了历史和尊严，并且制造了追击战的现场，毋庸置疑，这一现场就是东京审判的法庭。”^[31]小堀绕了一大圈，落点在东京审判上，对东京审判进行了一番批判，其主要观点前已介绍，此略。小堀又称：“夺回以日本国民为本位的历史解释权，在此基础上重新展开历史问题的思想斗争，第一阶段是打破东京审判史观，为此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史料武器”，“能否发挥解释的说服力，还在于掌握史料者的洞察力”，“在这场思想战中，我们有意识地反击才算是真正的开始……要尽早注意从我们阵营的脱离者以及对敌内应分子的出现，不必计较小的、部分的胜败之喜忧，决定最后胜负要有百年的目标。”^[32]也许，小堀意识到“夺回历史解释权”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所以“放眼未来”，甚至百年。这也提醒我们警惕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的顽固性和严峻性：一是绝非一个早上，或者日本一位领导人的轻易承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战争受害者一代及他们的遗族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人们的感情记忆趋

于淡漠之时,在“自存自卫说”或“亚洲解放说”仍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未来的历史教育以及判断那场战争的是非标准都将出现困惑,当代人的责任显而易见。

此期《正论》还收录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重量级”人物中村粲同原东京大学校长林健太郎的一组辩论文章。林健太郎从批判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角度,指出:“近年来,高唱‘克服东京审判史观’的人们的活动越发活跃,这些人的代表人物有小田村四郎、小堀桂一郎、中村粲、渡部升一等,提倡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东亚百年战争’(说)……今天的‘肯定论者’指责美国很早就采取反日态度都是出自此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林房雄是今天‘克服东京审判’论者的先驱者,而且两下对比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33]

中村粲立刻著文反驳,他并非恼怒林健太郎把自己当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代表人物,而是对林健太郎把自己比同林房雄颇感“委屈”,开篇辩解称:“林教授强调‘肯定论者’比林房雄更为偏激,从他的论述中至少可以看出误解、曲解和偏见。”^[34]随后,中村粲从日韩合并的历史着笔,列出九个题目反击林健太郎。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村氏指责中国“对‘同样是亚洲人的日本’背信弃义”,“勾结诱使三国干涉‘同是亚洲人的日本’,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人手中获取了南满洲,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又策划依靠英美力量把‘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从满洲驱逐,这是支那传统的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策略,即结交遥远的第三国来制服邻国。”^[35]这里,中村氏口口声声“同是亚洲人的日本”,言外之意,是把日本摆在亚洲霸主的位置上,中、韩等亚洲国家应该与“同是亚洲人的日本”同心同德,接受它的侵略或奴役,否则就是“背信弃义”。对九一八事变,中村氏认为,(满洲事变)“使满洲安定,诚然,是行使了谋略和武力,但结果是把民怨沸腾的压制者、类似土匪的张学良军队驱逐境外……在安定秩序的基础上,15年间满洲的发展和繁荣才有可能……只有从这一点上论述事变的功罪,才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历史议论的趣味也在这里。如今,日本的企业在大连受到欢迎,这种现象与满洲曾经繁荣

的记忆不无关系吧。”^[36]

中村粲的反驳引发林、中村两人的新一轮论战。林健太郎批驳“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的“亚洲独立说”,指出:“战争的结果确实带来了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但是,那是日本战败后的事情,并非是战争中日本让他们独立的。菲律宾和缅甸虽然建立了‘独立政权’,但是在日本军队军事驻扎下,日军享有自由行动的全权,这不能说是独立国家。更奇怪的是,‘亚洲解放论者’只是举出(东)南亚民族的例子,却无视近邻的朝鲜民族和中国民族。”^[37]中村氏急忙上阵迎战,仍然从合并朝鲜入手。中村认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我国的独立,勿宁说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而战,这样的看法才符合历史的事实。与其说是日本的自卫战争,勿宁说是为了朝鲜的独立和近代化而战。其结果,不仅朝鲜,连清国也展开了近代化(建设)。已经步入近代化的日本同拘泥古代遗制的朝鲜和支那而战,是东亚新旧(制度)的冲撞,因此,日清战争具有历史意义。”^[38]对九一八事变,中村氏强调事变前的背景,认为当时的形势迫使日本必须解决满洲问题。“一是国民党正在被赤化;二是苏联和中共策划推翻蒋介石;三是国民政府把排外对象从英国转向日本;四是国民政府实施革命外交,收回国权的对象包括满铁、旅顺、大连等日本在满的主要权益。”因此,“满洲事变不只是我国的责任,大部分责任在支那一方”,“最重要的是要广泛、深刻地思索导致事变的背景,在历史性论述满洲问题之时,谋略等技术性问题只是第二位的。”^[39]这里,我们发现中村氏的逻辑思维极度混乱,明明是吞并了朝鲜,却偏偏说是为了朝鲜“独立”;明明是关东军武力侵吞中国东北,却偏偏把责任推到中国的身上。以这样的视角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当然是谬之又谬。

中村氏还有一个歪理,即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秩序紊乱、治安恶劣”。他说:“支那自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产业经济落后,看不到近代国家的发展呢?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无秩序和治安恶劣,列国长期持续地反对支那撤消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对支那的商业性进出也犹豫不决,最大的障碍是支那的无秩序和治安恶劣,没有秩序

的国家就失去了信誉……维护国家秩序需要严正的警察和军纪严明的军队,但无论在支那、还是在满洲都不具备。”^[40]不言而喻,中村氏炮制这样的歪理,是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不仅出发点荒谬,根本站不住脚,也暴露出其鄙视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阴暗心理。

中村氏与林健太郎的论争共进行了四个回合,由于观点截然不同,结果当然还是各持己见。在最后一篇文章中,中村氏固执地结论称,“日俄战争以来,我国领有他国的土地只有韩国和委任统治的南洋诸岛,此外再也没有。21条也没有要求领土和驻兵权,此后一直到东亚战争终结,可以说对支那等其他国家连一寸领土的要求也没有过,中国今天仍然支配着满洲、西藏、新疆等省……大东亚战争从初战开始,依靠我国武力一扫英、美、荷的殖民地,为东南亚各民族的独立拉开了序幕,请林健太郎务必认识这一严正的事实。不行使武力,东南亚各民族的独立无异于坐等百年河水清,当时,只有我国才具备这样的武力和气魄”,“开战时我国的自由贸易圈被剥夺,连在满权益都要求归还,维持国民和军队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也拒绝供给,所以说,开战正是为了自存自卫的紧急避难措施。”^[41]这里,中村氏采取闭目塞听的混混儿手段,把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武力侵吞中国东北,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以及入侵东南亚、太平洋地域的历史事实硬说成是“没有领土要求”,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把数百万军队派到海外究竟是为了什么?

三、“自虐史观”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跳出来大放厥词,成为第一位跌下政坛的“失言大臣”。此后,政治家们“沉寂”了一段时日,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失言大臣”又一个接一个地亮开了嗓门,甚至置个人的政治生命于不顾,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日韩合并、从军慰安妇、东京审判等问题大放厥词。诸如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渡边美智雄、江藤隆美等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知识界冒出一个颇有市场和影响的“自虐史观”,^[42]按照“自研会”领军人物藤冈信胜的解释,“自虐史观”即“自我否

定(的史观)”。^[43]

藤冈氏认为:(让)“孩子们诅咒抨击自己的祖先,其结果使传统断绝、历史丧失和道德沦丧,如果持续这样的教育,日本的国家精神即将全部崩溃”,“把我国国民置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残暴非人性的人类集团的地位上,不断地描绘我国恶魔般的历史,鞭笞、诅咒、辱骂、抨击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历史观点、精神状态就是‘自虐史观’”,“‘自虐史观’是缠绕战后日本社会、尤其是媒体和教育界的疾病,是沉疴,是增生的癌细胞。如果不清除这种疾病,日本就不能成为健全的国家。”^[44]藤冈把“自虐史观”描绘得如此可怕,煞有介事,揭开他的“宝盒子”,让我们看看他的“自虐史观”的究竟。

1996年,藤冈以一封长篇的《致文部大臣公开信》,要求政府在审定教科书时将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删除。他认为,(历史上)“没有从军慰安妇这一用语,慰安妇(妓女——括号原文)不是军属,是民间业者雇佣的女性,当时内地的妓女称作娼妓,战地的妓女称‘卖春妇’,没有必要加上‘从军’二字。”^[45]藤冈强调,战场上的慰安妇并非是强制性的,声称“如果是日军强制掳走朝鲜女性,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一份当时的命令文件”,“在战地服务的女性收入相当士兵的百倍”,“如果日军强制掳走慰安妇,朝鲜人为什么沉默不语?”,“自称原是从军慰安妇的老女人们的证言,是在伪证罪成立的条件下做出的证言,绝不可取”,“任何证言都没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在什么地方?日本什么部队?什么样的慰安所设施?都没有涉及,而且,证言内容经常变化,说她们是真正的慰安妇,证据在哪里?日本人太过于轻信,太容易被欺骗,真是令人着急。”^[46]藤冈既没有研究,也没有调查,就武断否认从军慰安妇的存在,其列举的“理由”更是不值得一驳。当然,藤冈公开信的根本目的在于反“自虐史观”,他在结尾要求文部大臣,“立即行使职权,向发行教科书的七家出版社下发‘订正申请劝告’。”

从这封公开信可以看出,藤冈宣扬的“自虐史观”,是指揭示或披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史观”。换句话说,绝不允许指责日本历史上的任何短处,尤其是近代以来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否

则就是“自虐史观”。因此,除了从军慰安妇问题外,藤冈还是一个坚决的南京大屠杀“虚构派”。2001年初,《诸君》杂志社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分别对“虚构说”、“少数说”、“事实存在说”等三派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藤冈在答卷中认为,南京事件被屠杀的人数“接近为零”,“因为是通常的战斗行为,战死的中国军人不应包括其内”。对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军人应视作“正规士兵”,予以屠杀“合法”。他还认为,中方的指挥官唐生智“负有最大的责任”。另外,对两少尉的杀人竞赛(百人斩),他回答称“完全不是事实”。他的结论是,日军在南京的行为只是“普通的战斗行为,并没有过火”。如果把南京事件收入教科书,“就成了反日宣传”。^[47]

藤冈氏认为,“自虐史观”产生的原因是“三种敌意合成”的结果:一是“原社会主义苏联对日本的敌意,即共产主义史观……是为了特定政治目而产生的历史观”;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敌意,认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时期一贯推行侵略计划,为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发动了战争,对其进行惩戒的盟国是正义的一方,这种观点被东京审判固定下来,即东京审判史观”;三是“中国与朝鲜对日本的敌意……是基于谢罪外交的历史观”。^[48]为此,藤冈竭力主张掀起一场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运动主体、为期十年的历史教科书运动。他声称:“日本人在战后漫长的时间里,成为被剥夺历史、没有历史的国民。今天,出现了战后以来刚刚开始、日本人恢复自己历史的机会,对于我国来说,也许是意想不到的最后机会。”^[49]显然,藤冈已经觉察或意识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正是他们煽动修改历史教科书,反“自虐史观”的最好机会。然而事与愿违,藤冈的十年运动梦刚刚开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内部就出现了分裂,一派势力分裂出去另立门户,与藤冈等人分道扬镳了。^[50]

对于“自虐史观”产生的原因,藤冈除了指出上述三个“国际原因”外,还抱怨国内知识界、左派人士以及新闻媒体等。他认为:一是“左翼势力集结在一起追究日本的过去”,“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在不可能畅谈未来的情况下,把全部精力转向追究日本的过去”,“为此,慰安妇问题成为他们最好的材

料……可以说,关注这一问题的人物是天才的阴谋家”;二是“从广义上信奉社会主义或幻想社会主义的人们,大体上分裂成两个流派,一个是‘共产国际左翼’,一个是‘市民派左翼’……两者在追究日本过去的过程中,相互间的对立也完全消失,<赤旗>和<朝日新闻>的报道完全相同”;三是“政治形势。由于坚持保守传统的政党分裂,自民党联合政权中出现了社会党,新进党又是仰创价学会鼻息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本应站在日本国家立场上合情合理发言的政党一时不知到哪里去了”;四是“保守派的言论人、研究者、知识分子团体,因社会主义崩溃,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束,陷入了一时安心的错觉……可是,通过奥姆真理教事件可以看出,它与共产主义是同根而生,左翼人士对奥姆真理教的内心同感,嘴上不说但实际上广泛地存在。”^[51]

藤冈信胜的“自虐史观”迎合和顺应了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趋势,尤其是战后出生、对战争和亚洲人民被害历史不甚了解的一代,其中一部分人在“自虐史观”的影响下,对国际社会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产生逆反心理,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日本同亚洲各国的正常关系。这种社会现象自然引起学术界正义力量的关注,有学者著文评论,“自虐史观”认为,“孩子们学习现行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越学习越会失去勇气,丢掉本国的自豪感,结果是培养自虐、反日的日本人,日本的国家将面临解体。”实际上,“所谓日本人的自豪是发自蔑视他国的强大国意识……装点成朴素的民族优越意识势必转化成国家意识,对他民族非人道的侵略行为不感到心痛,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孩子们的心理只有征服才是勇气、才是自豪,产生敌忾心,培养不出理性的思考能力”,“孩子们学习真实的侵略的历史,即使是黑暗的也不能掩盖,使之自我体会走向明天的教训,培养面向未来应该做些什么的思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开拓自己的希望,同亚洲各国人民连带在一起,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和真理的共有。即使一时地‘讨厌日本’,只有超越,学习到历史的真实才能领略现代人的意义,自己体味生活在当今时代的喜悦、勇气和自豪,把形成自己历史观的能力学习到手。”^[52]还有些学者主张,必须对孩

子们积极地展开真理教育,比如,“在讲授‘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达客观的事实,即这种评价的社会性和学问性;二是在评价的基础上让学生们学习到真实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推进学生们价值判断力、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思想自由的形成。”^[53]

四、“日本罪恶史观”

“日本罪恶史观”实际上是从“东京审判史观”和“自虐史观”等衍生出来的史观,即,凡是反省历史,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举动都被冠以“日本罪恶史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森村诚一及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等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察,公开出版了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恶魔的饱食》、《中国之旅》等著作,洞富雄等学者也出版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论著。战后以来长期被当局有意掩盖的731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作战、强制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强掳劳工等战争罪行一下子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于是一些有良知的知识界人士、市民团体配合亚洲民间被害人的赔偿诉讼,自发掀起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不断有日本违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被持续曝光。这种态势引起右翼社会的极度不满,千方百计欲否定日本的战争罪行,于是炮制出一个“日本罪恶史观”:一是攻击东京审判把侵略=日本=罪恶的模式强加到日本头上;二是借机煽动国民的抵触情绪。

最早提出“日本罪恶史观”的是田边敏雄。田边敏雄并不是专业的史学研究者,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但对战争时期日本军队的战争犯罪颇有“兴趣”,著有《被〈朝日〉贬低的现代史》、《追踪·平顶山事件》等。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正论派言论人”,经常在《正论》、《诸君》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多年来,田边千方百计为日本战争犯罪解脱,凡是有史料证实的日本战争犯罪的重大历史事件,田边总有“另类”的研究,以此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并把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一切论述诬之为“日本罪恶史观”。他认为:“‘日本罪恶史观’的最大根据是归还者的手记”。^[54]所谓“归还者”是指上世纪50年代被中国政府宽大处理的日本战犯组成的“中国归还

者联络会”(中归联),这些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逐渐认识到战争的罪恶,归国后以“手记”的形式编辑出版了《三光》一书,揭露战争时期日本的战争罪行,因为该书是战争经历者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具有难以否定的真实性及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所以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田边为了否认战争经历者的口述史,先入为主地污蔑这些人“在中国被洗脑,他们的供述没有信用”。^[55]至于这些人如何被“洗脑”,他拿不出一分证据,而是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把本国的历史置于血淋淋的残忍无道的位置上”,“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三光作战等,强调日本军队残忍性的教科书,以及推荐作为课外读物的书籍,(学生)如果读了这些书后,会理解日本是个如何残忍好色的民族”。^[56]应该说,这就是田边的心理“障碍”所在,他的反“日本罪恶史观”同反“自虐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推翻《三光》揭露日本战争犯罪的记载,田边声称其中的史实都没有经过“验证”,“我认为,证言者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口径一致地撒谎,或者是根据什么人的意志,强制全体人员提供虚伪的证言,或者是诱导,读者们则以为是真实的了。”^[57]那么,田边是如何“验证”史实的呢?《三光》一书记载有日军第59师团小岛少尉和难波博少尉二人的证言,揭露了1943年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山东临清一带展开“霍乱作战”,杀害无辜的农民,甚至将卫河决堤使病菌扩大蔓延的罪行。田边本来没有任何史实根据可以推翻二人的证言,于是“另辟蹊径”,宣称,第五十九师团长藤泽茂及部下14人被中国关押时提交有《自供状》,后来,这些《自供状》及当地被害农民的证言都被收录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一书中(指《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著者注),“藤泽师团长以下14人的自供与(《三光》)原文一样”。^[58]田边因此得出“结论”,《三光》一书中两名少尉的证言是“根据自供状”。的确,小岛和难波博是田边所称14人中的2人,也是直接参与细菌作战的现场指挥者,他们在中国被审查期间主动交了自己的战争罪行,回国后在《三光》一书中再次披露细菌作战的经过并不

奇怪。问题是,如果这些人真像田边说的那样被中国“洗了脑”,那么,这些人回国后完全可以推翻《自供状》,也可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但令田边失望的是,这些人并没有这么做,田边所谓的“强制”、“诱导”之说不攻自破。不仅证实田边的“验证”毫无意义,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战犯改造工作的成功。

接着,田边又“质疑”第五十九师团中的14名证言者“在承认(细菌作战)事件上是一致的……而且,每个人的证言又互相补充,像链条一样衔接,如果链条的主要部位脱节,整个供述将一举崩溃。”^[59]田边列举的14名证言者都是直接参与细菌作战的官兵,他们的供述自然是一致的。也许,他们中的人由于军阶不同,位置不同,可能对整个战局的把握各有局部性,但都参加了此次细菌作战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从田边质疑证言“一致性”的心理可以揣摩到,其实,他寄希望的是14名证言人的证言相互脱节,这样才可以使整个供述“崩溃”。在无法攻破证言者证言的情况下,田边又臆想推断,日军实施细菌作战无异于“自杀行为”,因为日军也在现场,不可能是日军人为撒播。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的林茂美证实,是他将霍乱菌交给柿添军医中尉命其散播。田边为此找到柿添,但柿添称病,由夫人出面否认。田边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又借题发挥一番,认为“当时中国河水泛滥,霍乱等瘟疫流行并不奇怪”。^[60]他还呼吁当年参战的老兵站出来“打破沉默”,“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并非不可能,对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能吞吞吐吐,应该明确地予以反击,这是对下一代应该负起的责任”等。^[61]

由于“中归联”老兵们回国后编写出版了《三光》,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杀光、烧光、抢光的罪恶行为,一些出版机构依据学术界的考证和研究,认为事实的确存在,遂将日军的“三光作战”收在教科书中。田边对此分外气恼,专门撰文呼吁“从教科书中删除三光作战”。田边指出,“日军不存在‘三光作战’,也没有这样的资料或史料。日军把‘三光’作战称之尽灭作战,但‘尽灭作战’也不是作战名称,与使用歼灭、击灭一样,不过是像口令一样的语言而已”,“把日本人不知道的作战当作史实收进教

科书,把(日军)残忍的样子告诉学生,为了考试,学生们还要默记‘杀光’、‘烧光’这样的词,简直是荒唐可笑。”^[62]为了推翻日军“三光作战”的事实,田边针对日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关于“三光作战”的证词进行了“考证”。铃木在被审查期间曾供述,“当时,我命令部下实施三光作战,由于三光作战的实施,才能确保日本军队的势力范围,联队长按照我的意图,实行了残酷的行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一在《日中战争·研究丛书(10)》中收录了铃木的自供,并记述“铃木中将对在长城以南实施无人区政策负有全部责任,接受了有罪判决”,“铃木在战犯审判时出具的证言极其珍贵,直率地讲出大部分事实,原日军中的许多人都认为铃木是个比较容易接触的人。”^[63]田边似乎一下子发现了“破绽”,称“‘是个比较容易接触的人’与事实无关,难道能够以此作为理由,就认定(铃木)直率地讲出了大部分事实吗?,姬田教授真是随意地臆测”,“姬田教授调查了日军哪个部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姬田教授根本没有到该部队调查的痕迹。”^[64]确实,田边为了否定“三光作战”也找了几名铃木的部下,通过他们的证言希冀否认“三光作战”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的证言没有一份是有实有据、能够经得起推敲的,这使田边摸不着边际,不免有些沮丧,只好强词夺理:“日本方面不进行调查,只依据(战犯)自供状、日记之类,延续中国的宣传套路进行研究,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结论”,“像姬田教授说的那样,铃木承认中国揭发的事实,不能算作是供述,而是作为败军之将把罪过揽起来,应该这样来理解他的证言。”^[65]

在日本,田边又是较早的研究“万人坑”的学者,也是第一个质疑万人坑存在的学者。他称,由于记者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万人坑因此广为人知”,“但时至今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以及任何一位学者都没有采访否认者一方,即,有关万人坑的报道,完全是中国单方面的说法,根本没有日本的证词。”^[66]于是,田边的结论是“万人坑是捏造”,“完全是中国的捏造”。他的理由或根据有两条:一是“没有一个日本人真实地看见过万人坑”;二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满洲进行

的唯一一次沈阳审判中,没有一个案例是以这样的(制造万人坑)嫌疑被判刑,也没有调查和逮捕的案例”。田边在陈述上述两条理由后又进一步阐述:“万人坑如果是事实,(日本)战败时理应还存在,当地的中国人也不会漠视,自然要频发对日本人的报复,把许多日本人送上法庭要求处以极刑。而且还会把现场的惨状公布于众。但是没有这样的事实。”^[67]人们知道,日本侵华期间除了屠杀大批和平居民外,还强制驱使大批劳工掠夺中国的煤、铁、木等资源,由于饥饿、冻馁、疾病以及日伪军警的暴行,无数劳工死于非命,形成遍及中国沦陷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万人坑,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田边非要向历史的真实挑战不可,无视至今仍触目可见的日本战争犯罪罪证遗址。事实上,有许多日本人到过万人坑现场考察,日本的主流媒体以及许多学者也都在各类报道或著述中记载了万人坑的真实存在,这是用视而不见的颠预抹杀不了的。另外,田边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人民并没有对日本人施加报复,他更无法理解的是,正是中国人民敞开自己的心胸抚养了数以千计的日本遗孤。恰恰是田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演绎出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二条理由。

注:

[1]五十岚武士、北冈伸一:《争论·东京裁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筑地书馆,1997年版,第183页。

[2]林房雄原是日本共产党作家,参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转向”,充当统治集团的吹鼓手。

[3]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76年版,第159页。

[4]伊藤隆后来加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

[5]伊藤隆:《昭和政史研究への一视角》,《思想》,1976年6月号。

[6][7]栗屋宪太郎:《“东京裁判史観”とは》,藤原彰、森田俊男编:《近现代史の真実は何か》,大月书店,1996年版,第158页、第161页、第162页。

[8]纪延许:《中曾根康弘》,宋成有编:《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9]所谓“正论派言论人”是指一些右翼学者经常在带

有右翼倾向的《正论》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自诩为“正论派言论人”。

[10]藤冈信胜:《战后教育と东京裁判》,五十岚武士、北冈伸一编:《争论·东京裁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第195页。

[11]“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编:《新しい歴史教科書》,扶桑社,2001年版,第294页、第295页。

[12]中村繁:《大东亚戦争への道》,展転社,1991年版,第654页。

[13]小堀桂一郎:《さらば敗戦国史観》,PHP研究所,1992年版,第79页。

[14][15]渡部升一:《新忧国论》,徳间书房,1997年版,第222页、第223页、第227页。

[16]清水馨八郎:《マッカーサーと反日的日本人の罪》,《正论》1996年7月号,第53页。

[17][18]富士信夫:《私の見た东京裁判》下,讲谈社,1988年版,第542页、第543页。

[19]中村政则:《昭和史研究と东京裁判》,五十岚武士、北冈伸一编:《争论·东京裁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第184页、第185页。

[20]大沼保昭:《东京裁判から戦后責任の思想へ》,东信堂,1997年版,第151页。

[21]瀬島竜三:《大东亚戦争の実相》,PHP文庫,2000年版,第277页。

[22][23][24]渡部升一、日下公人:《内なる矜持として——日本人にとって大东亚戦争とは何であったのか孤独のなかで噬み締める栄光と苦悩》,《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20页、第22页、第22页。

[25]富冈幸一郎:《大东亚戦争の‘义’とは何か》,《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47页。GHQ即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略称。

[26][27][28][29]富冈幸一郎:《大东亚戦争の‘义’とは何か》,《正论》(别册),第49页、第50页、第52页、第57页、第53页、第54页。

[30][31][32]小堀桂一郎:《それぞれの歴史観》,《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73页、第78页、第85页。

[33]林健太郎:《一九八九年を忘れるな》,《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92页、第93页。

[34][35][36]中村繁:《林健太郎氏の批判に答える》,《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100页、第104页、第105页。

[37]林健太郎:《教科書で書くべき歴史》,《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112页。原文可能笔误,把东南亚写成南亚。

[38][39][40]中村繁:《林健太郎氏の戦争史観を论す》,《正论》(别册),2006年12月,第116页、第117页、第119页。

[41]中村繁:《なぜ語らぬアジアの歴史責任》,《正论》

(别册), 2006 年 12 月, 第 168 页、第 169 页。

[42] 如前所述, 早在中曾根时代就提出“自虐”一词, 只是未进行归纳, 到 1990 年代由“自研会”抛出。

[43][44][45][46][48][49] 藤冈信胜:《‘自虐史観’の病理》, 文芸春秋社, 1997 年版, 第 2 页、第 2 页、第 18 页、第 20 页 - 第 23 页、第 297 页、第 298 页、第 301 页。另, 这里的军属并非汉语意义的军人家属, 日语军属的意义是指部队中从事后勤、卫生、运输、技术之类的随军人员。

[47]《诸君》杂志社编:《まぼろし派・中间派・大虐杀派 三派合同大アンケート》,《诸君》, 文芸春秋社, 2001 年 2 月号, 第 183 页。

[50] 2009 年 4 月,《新历史教科书》虽然再次获得“合格”通过, 但原来的扶桑社不再出版该书, 改由自由社出版, 暴露出其内部的公开分裂。

[51] 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国民の油断》, PHP 研究所, 1996 年版, 第 222 页 - 第 225 页。

[52] 山科三郎:《“自由主义史観”は二一世紀の日本をどこへみちびくか》, 松岛栄一等编:《“自由主义史観”の病理》, 大月书店, 1997 年版, 第 19 页 - 第 21 页。

[53] 佐贯浩:《教育における価値相当主義と“自由主义史観”》, 松岛栄一等编:《“自由主义史観”の病理》, 大月书店, 1997 年版, 第 262 页。

[54][55][56][57][58][59][60][61] 田辺敏雄:《‘沈黙’支える日本罪恶史観のウソ》,《正论》, 1996 年 10 月号, 第 62 页、第 63 页、第 65 页、第 67 页、第 69 页、第 70 页、第 76 页、第 77 页。

[62][63][64][65] 田辺敏雄:《‘三光作戦’の教科书削除を要求する》,《正论》, 1996 年 12 月号, 第 50 页、第 59 页、第 59 页、第 63 页、第 64 页。

[66][67] 田辺敏雄:《‘万人坑’、‘三光作戦’、‘731’と言われたらで大量杀戮された》,《诸君》, 2006 年 2 月号, 第 96 页、第 97 页。

[责任编辑: 郭祥]

The Criticism in Social View of War and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Right - wing Forces

Wang Xiliang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tory Institute, research fellow, Harbin 150003)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in the course of leading the new conservatism, beautifying aggression, shir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denying war crimes, Japan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spread, reflecting the Japanese right wing, politicians deep-rooted concept of social war and history are still at work, except during the war concoct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self-existence and self-defense", "Asian liberation" and the resurgence of the absurd view of history, but also have thrown the "Tokyo Trial view of history", "masochistic view of history" and "view of Japan evil history" and so on, in order to deceive the audio-visual, call white black, shock and disturb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World War II, and lay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Keywords: Japanese right-wing; Social view of war and history; Criticism

日本右翼社会の戦争観と歴史観についての批判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ハルビン 150018)

要旨: 前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路線で歩む日本は侵略戦争を美化、戦争責任を拒否、戦争犯罪を否定する歴史修正史観が蔓延され、日本政界と右翼社会から変わらぬ戦争観と歴史観を表している。

戦争当时に作られた「自存自衛」、「亜細亜解放」などの謬論が再び現れ、「東京裁判史観」、「自虐史観」、「日本罪惡史観」などの言叶は连発し、二次大戦以来の国際秩序を混乱させ、日本の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化を企んでいる。

キーワード: 日本右翼、社会戦争観と歴史観、批判

일본 우익사회 전쟁관과 역사관 비판

왕시량 (王希亮)

(흑룡강성 사회과학원 연구원 하얼빈 150018)

요점: 20 세기 90 년대 이래 일본은 신보수주의 노선하에 침략전쟁을 미화하고 전쟁책임을 전가하고 전쟁책임을 부인하는 등 표현형식의 역사수정주의가 범람하였다. 이는 일본 정치계와 우익사회에 깊숙히 뿌리 박힌 전쟁관과 역사관이 여전히 고개를 들고 있음을 보여주고 전쟁시기 일본 당국이 만들어낸 《자존자위》, 《자학역사관》 및 《일본죄악역사관》 등을 만들어내서 2 차대전 이래의 국제질서를 타격하고 방해하여 정치와 군사대국화를 위해 기초를 마련하였다.

키워드: 일본우익, 사회전쟁관과 역사관, 비판